

李仲谋
编著

中外文学史基础知识

题
雲漫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出版社

· (皖) 新登字 08 号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外文学史基础知识/李仲谋 编著. —合肥: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出版社, 1995 年 6 月

ISBN7-312-00628-0

I 中外文学史基础知识

II 李仲谋 编著

III ①中国文学 ②外国文学 ③文学史

IV I

凡购买中国科大版图书, 如有白页、缺页、倒页者, 由承印厂负责调换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安徽省合肥市金寨路 96 号, 邮编: 230026)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印刷厂印刷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850×1168/32

印张: 6.5

字数: 169 千

1995 年 6 月第一版, 1995 年 6 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 1—10000 册

ISBN7-312-00628-0/I·2

定价: 6.00 元

目 次

绪 言	(1)
上编 中国文学史	(3)
一、中国古代文学	(3)
1. 先秦文学	(3)
2. 秦汉文学	(16)
3. 魏晋南北朝文学	(23)
4. 隋唐五代文学	(34)
5. 宋代文学	(70)
6. 元明文学	(97)
7. 清代文学	(118)
二、中国近代文学	(137)
三、中国现当代文学	(145)
下编 外国文学史	(177)

绪 言

文学史是研究文学发展历史的科学。它着重研究文学发展的过程，总结文学发展的规律，其中包括阐述各种文学内容、文学形式、文学思潮、文学流派产生、发展和演化的历史。寻求它们前后相承相传、沿革嬗变的规律，揭示文学的发展与各种时代因素、社会因素（政治、经济、军事、哲学、宗教、道德、艺术等）的关系以及本民族文学的发展与各民族文学相互交流、影响的关系，对各个时代的重要作家作品在文学发展中的历史地位和作用作出评述等等。

文学史与文学理论、文学批评同属文艺学的范畴。它们都以文学为研究对象，但研究的着眼点和侧重点有所不同，文学理论着重研究和探讨文学的基本原理和一般规律，文学批评着重研究和评价具体的文学现象（主要是同时代的作家作品）。研究文学史需要以一定的文学理论观点作为指导，也需要吸收历代文学批评成果；同时，文学史研究中所得出的规律性认识又可以丰富文学理论，并为文学批评提供借鉴。可见，文学史与文学理论、文学批评的关系十分密切，是相互关联而又相对独立的三门学科。

文学史的研究和撰写，通常都有一定的范围。这是由于不同地域、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以及不同时代、不同类别的文学，各自有着不同的发展历史。根据不同的范围，文学史著作大致可以分为四类：①是按地域、国家、民族编写的文学通史，如《中国文学史》、《汉文学史纲要》、《欧洲文学史》；②是在一国（或一个民族）文学史中又分历史时期的断代文学史，如《魏晋南北朝文学史》、《中国现代文学史》；③是在一国（或一个民族）文学史中又分不同类别的分类文学史，如《中国小说史略》、《中国诗史》；④是既断代又分类的文学史，如《晚清小说史》。

本书是为中等文化水平的青年学生和文学爱好者而编写的。文学史是人类历史的一个重要部分。使在校学生和具有中等文化水平的青年，懂得一点文学史，特别是中国文学史的基础知识，既有益于增长知识、提高文化素质，同时亦是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需要。本书依据现行语文教学大纲中关于文学史教学的基本要求，并在大纲基础上有所拓宽加深，主要内容是中国文学史，略涉外国文学史，既以史为线索，较系统地、简约地以笔记形式介绍了中外文学发生、发展和嬗变的史实，又有选择地介绍了语文课本中所选入的重要作家及其代表作品。编者企望本书能成为在校学生的课外读物和青年自学的参考。

上编 中国文学史

一、中国古代文学

1. 先秦文学

远古至秦统一前的全部文学。“先秦”一词，最早见于汉代，后来主要指春秋末期至战国的一段时间。我们现在泛指秦代以前，包括夏、商、西周、春秋、战国，这是奴隶制时代和从奴隶制向封建制的过渡阶段。先秦文学包括远古口头文学、奴隶社会文学和封建社会初期文学。

远古时代基本上还没有文字，原始文学只能是口头文学，在群众中广泛流传，不断充实，不断提高。从《山海经》、《淮南子》、《楚辞》等后世著作所记载的有关内容看，古代神话原本是十分丰富多彩的，后来到了有文字记录的时候，可能受到史官求实精神等的影响，往往被当作史实来加以修改、删削，甚至曲解，使其本来面目显得比较模糊。

夏禹传帝位于其子启，开始了原始社会向奴隶社会的转变。奴隶社会在上升时期，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促进了人类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进步。到了商、西周，出现了光辉灿烂的文化，尤其是文字的日趋进步和广泛使用，对文学的影响至大。殷墟出土的甲骨文，殷周的青铜器铭文，《周易》以至《尚书》，反映了书面语言由句而章、由章而篇的形成过程。诗歌的兴盛，是西周春秋中叶文学的主要成就，后来被结集为《诗经》，这是中国最早的诗。

春秋末年，铁器和耕牛的使用，大大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地

主经济逐渐发展起来，社会向封建制度转化，奴隶主贵族统治衰败后文化下移。士作为知识分子阶层兴起，涌现了不少政治家和思想家，代表着不同的阶级、阶层、集团，主张各异，互相辩难，到战国时期形成了一个学术文化繁荣的百家争鸣的局面。这些政治家、思想家，有的同时也是当时的散文家，这就是“诸子散文”；有的是历史家，历史家们旨在总结各国成败之理，对历史事件作某种评价，这就是“历史散文”。两者都有较高的文学成就。

战国时期列国纷争，七雄中秦、楚称霸。这时，中国第一位伟大诗人屈原的出现打破了自《诗经》之后诗坛 200 多年的寂寞局面，他在逆境中写下了可与日月争辉的诗篇。屈原之后，楚有宋玉、唐勒、景差等人，他们的诗篇合称为“楚辞”。

先秦文学不仅是中国文学的开端，而且是中国文学的基石。它不仅深刻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现实，而且《诗经》、《楚辞》是公认的古代诗歌写实和浪漫两类创作方法、艺术风格的源头，诸子散文和历史散文作品的形式风格多样，后世的各种文体也大多被认为源于先秦。

《诗经》 我国最早的诗歌总集。它收集了从西周初年（前 11 世纪）到春秋中叶（前 6 世纪）大约 500 年间的诗歌 305 篇。《诗经》在先秦称为“诗”，或举其整数称“诗三百”，到汉代，被学者奉为经典之一，才出现“诗经”的名称，并沿用至今，它最后编定成书大约在公元前 6 世纪中叶。《诗经》中的诗当初都是配乐的歌词，保留着古代诗歌、音乐、舞蹈三结合的形式。它分为风、雅、颂三个部分。风，是各诸侯国的土风歌谣，包括十五国风，有诗 160 篇，在《诗经》中最具有思想意义和艺术价值，多方面反映了劳动人民的苦难生活和思想感情。这些表现青年男女之间婚姻恋爱题材的、歌颂辛勤劳动的、赞美爱国主义精神的、反映战争和徭役给下层人民带来苦难的、揭露讽刺统治阶级内部矛盾和腐败荒淫的作品，成为我国上古时代一部重要的形象历史和

当时社会生活的真切图画。雅，分大雅、小雅，有诗 105 篇，大部分是贵族朝会、饮宴时的乐歌，大多数出于王公贵族和官僚文人之手，文字比较艰深，不象风诗那样清新泼辣，但其中一些周民族的史诗，追述了远古传说中的人物，带有神话色彩，有重要的史料价值。颂，分周、鲁、商颂，有诗 40 篇，是贵族祭祀宗庙的舞曲歌辞。《诗经》中有不少长短不齐的句子，但基本上是四言句，隔句用韵，它已经善于运用章句的重叠和叠字、双声、叠韵等修辞手法，不仅增加了诗的音乐美，而且表达出细微曲折的思想感情。《诗经》的表现手法，前人概括为赋、比、兴。赋就是陈述铺叙，比就是比喻，兴就是借助其他事物作为诗歌发端。《诗经》以其内容丰富、思想和艺术上的高度成就，在中国以至世界文学史上都占有重要地位。它的广泛而深刻的描写现实、反映现实的精神，开创了中国诗歌的优秀传统，对后代文学影响很大。中国古代诗人，都在不同程度上受到《诗经》的熏陶。

《伐檀》是一首痛斥剥削者不劳而获的民歌。共三章，每章九句，反复吟唱。每章前三句写河边伐木造车的情景，自言劳作之艰苦，后六句用质问的口气直斥剥削阶级不劳而获、尸位素餐，反映了当时两个对立阶级的尖锐矛盾，表达了劳动者的愤慨和反抗情绪。

《硕鼠》把奴隶主贵族直接喻指为贪婪成性的大田鼠，形象恰当，深刻地表现了劳动人民对剥削者无比愤怒的感情。共三章，每章八句，章句重叠，回环咏唱，层层递进地抒发了对“硕鼠”的强烈憎恨，对“乐土”的向往追求，公开表示要以逃亡来进行反抗。

先秦散文 散文产生于文字发明以后，较晚于诗歌。从没有文字到有文字，从片言只语到成段成章，再到中心明确、结构谨严的篇章，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标志我国古代散文已经形成的是《尚书》，这是上古一部官方历史文献。《尚书》之后，

散文分别向着偏重于论说的诸子散文和偏重于记述的历史散文两方面发展。先秦时期，文学与非文学的界限还不分明。当时的散文是与韵文相对的一种文体，基本上是哲学、政治、伦理、历史方面的论说文和记叙文，但由于它们已经具有较强的文学性，在中国文学发展中产生过很大影响，因而被视为先秦文学的一个组成部分。

诸子散文 春秋末年开，奴隶制逐步为封建制所代替，经济、政治、意识形态都发生了巨大变化。尤其是“士”阶层兴起壮大，活跃于整个社会。他们代表着不同阶级、阶层的利益，著书立说，提出不同的政治要求和主张，互相辩论，产生了诸子散文。由于当时诸子的思想比较解放，能直抒己见，自由选用适当形式，形成诸子各有个性的文风，多种论说文体已大体齐备。汉人刘向、刘歆父子和班固等人，对先秦文化学术进行总结整理，把诸子分为儒、道、阴阳、法、名、墨、纵横、杂、农、小说十家。各家著述繁多，举其要者：儒家有《论语》、《孟子》、《荀子》；道家有《老子》、《庄子》；法家有《商君书》、《韩非子》；墨家有《墨子》；杂家有《吕氏春秋》，还有兵家的《孙子兵法》和《孙臆兵法》等。由此可见，论说文在春秋末至战国期间的迅猛发展。

孔子与《论语》 孔子（前 551—前 479），名丘，字仲尼，鲁国陬邑（今山东曲阜）人，春秋末年的教育家思想家，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孔子生活在新兴地主阶级逐步取代奴隶主阶级的时代，早年做过管理仓库和畜牧的小吏，50 岁时做过短时间的鲁国司空、大司寇，引摄相事。他在政治上主要倾向是保守的，思想言行的核心是“仁”，主张恢复西周的礼乐制度，并为实现他的政治主张而率弟子周游列国，宣传他的主张，但不为各国所用。孔子的思想从汉以后长期以来被封建统治阶级加以改造和利用，成为维护封建制度和统治人民的精神工具，对中国和日本等东南亚国家的社会影响极为深广。孔子又是一位教育家，他创办私学，开

私人讲学之风，主张“有教无类”，“因材施教”，据说有弟子三千，其中著名的有七十二人。孔子论述学习的态度和方法的名言，在今天有些还有借鉴意义。孔子对整理和普及古代文化作出了很大贡献，编订了《尚书》、《易》、《礼》、《乐》等古代文献，对我国思想文化的发展有巨大的深远的影响。

孔子的言论，由其弟子和再传弟子辑录而成《论语》一书，是儒家学派的重要经典。内容以伦理、教育为主。它虽非文学著作，但由于孔子开始注重文采，《论语》历来为文士诵习，对文学的影响极为深远。《论语》是语录体散文，章句简短，言简意赅，富哲理，多警句。有些篇章章句较长，文辞尤畅，具体展示了孔子及其弟子的精神状态，表现出一定人物的个性。

《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侍坐》章，通过对人物各自的语言、动作的描写，表现出孔子的循循善诱，子路的直率，冉有的谨慎，公西华的谦虚，曾皙的从容。《荷人》章中长沮、桀溺、丈人遗世傲慢的隐逸形象，写得具体生动。

孟子与《孟子》 孟子（约前372—前289）名轲，字子舆，邹（今山东邹县）人，是孔子之孙孔伋的再传弟子。战国时，各诸侯国互相攻伐兼并，孟子标榜唐虞三代之德，把孔子侧重于道德修养的“仁”，发展为他的统治主张“仁政”、“王道”，也是不被诸侯所用。孟子提出了民贵君轻思想，常以救民于水火的姿态奔走呼号，主张“省刑罚，薄赋敛”，在当时都有进步意义。孟子以孔子学说的继承者和捍卫者自居，故后世常将“孔孟”并称。

《孟子》是记载孟子言行的书，为孟子及其弟子所著，共七篇，后世被列为儒家经典。《孟子》虽仍属语录体，但已从《论语》主要是单人短篇语录发展为基本上是对话的长篇大论，更能把论题阐发得具体深入。《孟子》文章气势充沛，锐气逼人，感情激烈，富有雄辩性和鼓动性；还长于譬喻，善用寓言，对陈说事理、辩论是非，增强了说服力。《孟子》对后世散文发展的影响远过于《论语》，唐以后的古文家无不效法《孟子》散文。

《孟子》中的《得道多助，失道寡助》，论述国君“得道者多助”，多助则“战必胜”的道理。文章首先比较天时、地利、人和，以两种战争常见情况作论据，递进地论证，突出了“人和”对于战争的极为重要作用，再据此推论，归结出中心论点，阐明战争之胜败取法于人心的向背。文章的论述脉络，有如江河流淌，层浪相继，高峰过后，犹荡余波。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阐述关于修身、治国的主张。文章先以六个排句列举六个实例，据此论述，主要强调一个人只有经受困苦的磨炼和逆境遭遇的锻炼，才能养成坚韧毅力，增长治世才干，担当起大任。然后论述坏事可以引出好的结果，进而由修身推论到治国，得出“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的结论，文章一气呵成，气势磅礴。

《鱼我所欲也》，阐明了“舍生取义”的论点，孟子以鱼和熊掌不可兼得，舍鱼而取熊掌为譬喻，引出生与义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的观点，接着从正反两面权衡轻重，表明在生与死的取舍上要以“义”为准则。

《庄暴见孟子》，表达了孟子要国君“与民同乐”的民本思想。孟子在和齐宣王谈话中，因势利导，借题发挥，劝说齐宣王“与民同乐”，施行“仁政”。

《齐桓晋文之事》，是《孟子》中对话体文章的代表作，充分地体现了孟子游说国君的谈话技巧和雄辩才能，篇中以小问题引出大道理，比喻生动，说理透彻。

墨子与《墨子》 墨子（约前468—前376），名翟，战国初鲁人，也有说是宋人。据说他最初学儒者之业，受孔子之术，后摒弃儒学，并进而创立了墨家学说，与其弟子身体力行。

《墨子》为墨家经典著作，其中有墨子自作，有其弟子所记墨子的演说辞和语录，共71篇，今存53篇。《墨子》虽保留对话形式，但基本上已是初具规模的论说文，自觉地运用逻辑理论进行论证。《墨子》文字质朴，浅显易懂，常用设问、设难之法使论述

得以深入；还多用比喻，以求文章通晓。

《公输》属于记事散文，记述墨子止楚攻宋的故事，情节首尾完整，曲折生动。写楚王骄横愚蠢，公输般狡黠，墨子正气凛然、大胆机智，人物性格颇为鲜明。

庄子与《庄子》 庄子（约前 369—前 286），名周，宋国蒙（今安徽蒙城）人，曾任蒙漆园吏，未久去职，楚威王闻其才能，欲聘为相，然辞谢不就，一生穷困潦倒。庄子的思想观点和政治主张比较复杂，反映了没落奴隶主阶级的悲观厌世情绪和政治观点，但他对新兴地主阶级和儒家学说的批判，又往往成为后世一部分文人反对封建统治的武器。

《庄子》亦名《南华经》，为道家经典之一，计 52 篇，今存 33 篇，分内篇 7，相传是庄周自著，外 15 篇、杂 11 篇，多认为出自后学之手。《庄子》是战国时的一部杰出文学著作，在先秦诸子散文中具有独特风格。它大量运用类似于短篇小说式想象奇特的寓言，虚构人物形象与故事情节，擅长于体物入微的描写，用大量比喻与拟人手法写物抒怀，善于使用形象说理，行文结构上波澜恣纵，变化莫测，大大地开拓了艺术的境界，具有浪漫主义的艺术风格，这在古代散文中是很不多见的，对后世文学影响很大。

《庖丁解牛》，是《养生主》中的一则寓言，文章生动具体描写庖丁为文惠君解牛技术达到超凡入神的地步，引出庖丁自述，论证养生之道。这则寓言启示人们，办事要顺应自然规律的道理。文章意趣横生，富于形象性。

荀子与《荀子》 荀子（约前 313—前 238），名况，字卿，战国后期赵国人。年五十游学于齐，曾在齐国稷下担任祭酒，齐襄王时奉为学者，后又到楚国，春申君任他为兰陵令。荀子是战国后期的思想家、学问家和教育家，有系统的教育思想，晚年教授弟子并从事著述，李斯、韩非都是他的学生。

《荀子》一书，既是先秦重要哲学著作，也是重要的散文集。现存 32 篇，荀子是先秦后期的儒者，对于儒学有所传承，也有所

独创。《荀子》除哲学、政治、军事和典章制度方面的学术论述之外，还有《成相》、《赋篇》等文学作品。他的文章写得谨严细密，条理明晰，托譬说喻，引经据典，不为空谈，是先秦时代典型的经师学术之文。

《劝学》阐明学习问题。千余字中，集中而灵活地使用了六十多个比喻，比比相套，以比证比，大大增强了文章的生动性，还大量运用对偶排比句法，显得舞墨恣肆，气势酣畅。

韩非与《韩非子》 韩非（？—前233），出身韩国贵族，和李斯同学于荀子，战国末期思想家。但他的思想学术又源于老子，综合了商鞅、申不害等前辈法家思想，是法家学派集大成者。韩见国力衰弱，多次上书韩王，提出富国强兵、修明法制的主张，而不为所用，退而著书立说，成十余万言。他的思想反映了新兴地主阶级维护统治地位的要求。他的书传到秦国，为秦始皇所称赞，于是举兵攻韩，索要韩非。韩王派韩非使秦，秦王又不加信任，后又为李斯所陷，死于狱中。

《韩非子》一书共55篇，为法家重要著作。韩非主张行文写作以“功用”为目的，他的文章多属论辩文，犀利峻峭，逻辑严密，具有很强的说服力。经常使用类似归纳法，先举论据，再作论证，最后顺理成章得出结论。在论辩中，还善于运用逻辑上的矛盾律的原理，使论辩对方进退失据。先秦后期议论文中使用寓言成为一时风气，韩非子的许多篇章，对寓言故事的运用已很自如。

《智子疑邻》是《韩非子》中的《说难》篇中的一则寓言，仅43字，完整清楚地写出了故事的发生、发展、结局，以这则寓言嘲讽了单凭亲疏关系判断是非善恶的主观唯心主义，给人有益启发。

《扁鹊见蔡恒公》以病喻治国行事，寓意深刻，发人深省。扁鹊洞察力之惊人，桓公讳疾忌医之愚蠢，在情节深入发展中得到生动刻划。故事发展层层推进，语言简练明快，人物刻划采取了

白描手法。

《五蠹》反映了韩非反对复古、主张变革、提倡法治的观点。文笔犀利，论证充分，富于说服力。

《列子》 托名列御寇所著论集。御寇，战国时郑人，他的学说近于庄周。

《列子》原书已散失，现传《列子注》可能是东晋张湛所作。列子在唐天宝时诏为“冲虚真人”，《列子》为《冲虚真经》，为道教经典之一。全书8篇134则，大部分属先秦保存下来的民间故事、寓言和神话传说。这些小故事题材新颖，故事离奇，形象鲜明，寓意深刻，结构完整，语言恢谐，有较高的文学意义和思想价值。

《愚公移山》为《列子·汤问》篇中的一则寓言，塑造愚公形象，对比地描写智叟和愚公，神态毕现，衬托有力。歌颂劳动人民排除万难、艰苦奋斗的精神，改造自然的坚定信心和坚强毅力，富有教育意义。

《两小儿辩日》是道家学派讽刺儒家学派创始人孔子而虚构的一个故事，两小儿各以自己的生活体验作为根据，证明自己的看法，都是不科学的。孔子这样的大学问家也不能回答他们提出的问题，反映了古代人们要求认识自然，探索真理的精神。

历史散文 传说古代王侯身边设有左右史官，“左史记言，右史记事”（《汉书·艺文志》）。大事记于策，小事记于简。把简策按时间顺序编在一起，就成为史书，或称“春秋”，或称“史记”。到了战国，不独王侯，连卿大夫都有“侍史”。因此，各国史官都积累了大量档案资料，以备编纂史书，使史书内容更加丰富，形式也更加多样，有编年体的《左传》，有国别体的《国语》、《战国策》，有记个人言行的《晏子春秋》等，具有较高艺术成就，开创了我国史传文学的先河。统治者重视总结历史经验教训作为借鉴，造成了历史散文的兴盛，可惜流传下来的很少。各国的史

书《春秋》，只是编年的大事记，写得比较简约。《春秋》文字简短，寓有褒贬之意，后世称之“春秋笔法”，但其中的意义很不容易领会，后来就有了解说、补充它的书，为《春秋公羊传》、《春秋穀梁传》、《春秋左氏传》，世称“春秋三传”。

《左传》 《春秋左氏传》的简称，又名《左氏春秋》。关于《左传》的作者，司马迁、班固都说是鲁国史官左丘明。《左传》是按鲁国纪年写的一部叙事详细完整的编年史。其主要内容是记录了春秋列国的政治、外交、军事、经济等重大事件及其有关言论，还保存了大量史料，反映了那一历史时期的时代风貌。《左传》这部历史著作，具有很高的文学价值，它具体地记叙了许多错综复杂的历史事件。叙事曲折生动，提炼史料繁简得当，行文层次分明，引人入胜，富有故事性和戏剧性；记叙一些重要的历史人物，通过对话、行动和一些带特征性的细节，塑造人物形象，突出了人物性格，使人物栩栩如生，跃然纸上；语言简练而富有表现力。

《曹刿论战》记叙的是齐鲁长勺之战。以“远谋”二字为眼目，通过未战论君德，方战观士气，既战察敌情的三层描写，处处突出“肉食者”的见识短浅与曹刿的远见卓识。文字奇峻，情节出乎意料而又入乎情理，说明了鲁国能够以弱胜强的原因，提供了历史的借鉴。

《殽之战》记叙秦穆公冒险出师远袭郑国的事。以蹇叔预言秦师必败为线索，穿插记叙秦、晋、郑三方活动，刻划了众多个性鲜明的人物形象，描写外交辞令委婉得体，运用多种呼应手法，结构十分严谨。

《国语》 我国最早的一部国别史，又称《春秋外传》，其作者相传为左丘明。它记叙的是从周穆王到鲁悼公前后五百多年的史事，按周、鲁、齐、晋、郑、楚、吴、越分国编次，主要是记言，所以称为《国语》。《国语》不象《左传》那样对历史事件作完整的记叙，只是叙述若干主要片断，有较高的史料价值，文

学成就不及《左传》。但其中通过历史人物在各种政治活动中的议论、对话，把人物的面目、性格和他们的政治主张生动地表现出来，颇为成功。

《召公谏厉王止谤》记大臣召公以“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告诫暴虐凶残的厉王，要他听取百姓意见。厉王拒谏，一意孤行，终被国人放逐。本文旨在说服民众力量强大，民言不可壅塞的道理。记叙简练，说理生动，比喻贴切。

《勾践灭吴》记越王勾践卧薪尝胆，富国强兵，终灭吴国的经过。文章通过吴、楚势力的消长，说明麻痹纵敌的危险和发奋图强的重要。本文以夫差与勾践对比，生动地刻划了从失败中奋起而复仇成功的勾践形象。

《叔向贺贫》以对话形式体现议论内容，阐明不应“忧贫”而应“忧德之不建”的论点。晋国大夫叔向的言论是为了卿大夫身家长久之计，但对“骄泰奢侈，贪欲无艺”的行为提出批评，在当时有一定意义。叔向的议论是文章主体，他对比晋国历史上一贫一富的两个显赫人物的实例，从宣子的切身利益予以说服，条分缕析，有理有据。

《战国策》也是一部国别史，共十二国策，记叙战国初期到六国灭亡共240余年各国政治、军事、外交方面的史实。作者不可考，非一人之手。西汉刘向根据战国末年的纵横家著作编辑而成。全书共33篇，大部分是当时纵横家精谋善算的谋臣和纵横捭阖的策士，游说诸侯互相辩论时所提出的政治主张和斗争策略。全书内容驳杂，反映了当时尖锐的阶级矛盾和激烈的政治斗争，同时也暴露了一些统治阶级的荒淫残暴和人民被压榨的状况。从文学角度看，比起《左传》《国语》来，《战国策》的叙事更生动形象，有不少完整而富有戏剧性的情节；刻划人物栩栩如生，往往摄取人物的主要特征，用漫画式的夸张手法进行勾勒，个别地方甚至虚构情节，使人物的精神面貌更加鲜明、富有个性；文章长于铺陈，流畅恣肆，说理论辩的言辞犀利，气势激昂，体现了雄

辩夸饰的游说风气，对后代文学影响深远。

《齐策·邹忌讽齐王纳谏》写齐相邹忌规劝齐王勿为阿谀奉承所蒙蔽，齐王接受邹忌的劝告，广开言路，体察下情，终于政治修明，国力强盛。邹忌现身说法，以生活中的趣事，比喻治国的道理，寓意深长，娓娓动听，发人内省。

《燕策·荆轲刺秦王》是一篇完整的侠义故事，反映对暴秦的痛恨和不畏牺牲的反抗精神。通过对人物神态、动作、对话、行刺场面的描绘，塑造了荆轲这一英雄形象，特别是“易水送别”，慷慨悲壮。

《魏策·唐雎不辱使命》写唐雎肩负解除国家面临战争威胁的使命出使秦国，不畏强暴，驳斥秦王对安陵君的无理指责，理直气壮，慷慨陈辞，继而“挺剑而起”，惊心动魄，吓得秦王连声道歉。歌颂了唐雎为维护国家尊严敢于斗争的爱国精神。文章绘声绘色地描写唐雎与秦王的较量，人物神态言辞刻划得十分生动。

《赵策·触龙说赵太后》，记触龙说服赵太后为国事而以爱子出质齐国的经过。文章深刻地阐述了父母不应溺爱子女，要让他们为国家建功立业的道理。语言生动活泼，画出了一位善于揣度人主心理而巧妙进谏的栩栩如生的老臣形象。

《齐策·冯谖客孟尝君》，表现了冯谖的过人智慧和远见，以先抑后扬的手法，刻画冯谖形象，并用孟尝君与众客来衬托冯谖的才能。文章波澜起伏，摹写精妙，富于艺术魅力。

《吕氏春秋》亦称《吕览》，战国末秦相吕不韦门客各记所闻，共同编写，是杂家的代表作。全书26卷，共160篇，汇合了先秦各派学说，畅论天地古今之事，内容涉及很广，是适应百家争鸣的局面已告结束，秦国行将统一中国，思想界倾向于走上调和折衷统一思想的道路的产物。此书完成后，曾经“布咸阳市门，悬千金其上，延诸侯游士宾客，有能增损一字者予千金”（《史记·吕不韦列传》）。此书内容庞杂，代表了当时很高的思想成就和当时著作的最高形式。